

静水之下的深流

——荣荣诗歌的张力与平衡

赵淑萍

通观荣荣不同时期的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不断探索、持续成长的轨迹——不是越写越“精致”，而是越到后来越呈现出一种自然而开阔的气质，一种历经沉淀之后的质朴醇美。

荣荣的诗歌始终保持着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和对生存景观的凝视。这种凝视并非居高临下的，她替他们发声，却从不代替他们说话。她写自己的祖母、钟点工，写病孩、卖菜妇，写工厂女工。在《祖母》一诗中，祖母的形象是渺小卑微的，是被时间磨损的，她是一个人，也是那个时代裹着小脚的女性的命运缩影。“我”在追忆她时，实际上也是在辨认自己。“你从没存在过 或者你来过 又死了/或者我就是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既是对祖母平凡而苦难一生的认领，也是代际命运的叠合与互文——“我”与“你”的边界在追忆中模糊，建构起一种血脉深处的精神联结，也暗含对祖母的思念和致敬。荣荣不将祖母神圣化，而是让她获得一种隐性的“在场”，这种处理方式比任何颂歌都更具穿透力。

在《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中，诗人以惊人的细节密度刻画了一位都市老年劳动者的生存图景：“钟点工张喜瓶在又一个春天里/快速地移动着，一只茫然的蚂蚁/楼越爬越高 车越来越挤/搀扶的病人越来越沉/时间被她越赶越紧，而她拉下/七八十年代的衣领/五六十年代的劳作/三四十年的脸。”三个时间维度的压缩及层叠、错位，让一个被时代挤压的劳动者形象跃然纸上。春天是明媚的，而张喜瓶的人生却是黯淡的，劳动的卑微与生命的顽强并置，形成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张力。“移动”“爬”

“挤”“赶”等用词精准、锐利，甚至“刁钻”，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从而产生悲悯。

荣荣诗歌的魅力，还在于她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呈现出独特的复调特征：她既不沉溺于私密情感的絮絮诉说，也不高举性别对抗的激进旗帜，而是在爱情、婚姻与两性关系的日常肌理中，勘探女性生存的复杂境况。于柴米油盐的褶皱里探讨付出的意义，在肌肤相亲的温度中辨认自由的边界。有时，她诗中的女性是谦卑的，渴望被爱，甘愿付出，甚至有无限的包容。在《心舍利》中，她写道：“神啊！如果这辈子他无法完美/让我继续迷信他的不完美/无限依恋他的猜忌、挑剔和小性子。”然而，“小女人”姿态从不同于自我否定或依附。在《场景》中，她笔下的女性“站在椅子上”，俯视男性，“每个毛孔都张开饥渴的嘴”，发出“擦亮我吧 用你的火！”的指令。关于女性主义，荣荣的态度辩证而通透。她明确表示：“我不能因为我想做一个普通的女性（我本就是），而否认那些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在为女性争取权益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我敬佩她们。”但她有自己的定位：“我努力写好自己，因为我自己不是单个的，我是无数个我，我也代表了一个群体。”这种既保持距离又心怀敬意的姿态，恰是她女性意识的成熟之处。她写的是私密情感，抵达的却是普遍人性。

荣荣诗歌的语言和视角颇为独特。语言时而绮丽洒落，浪漫抒情；时而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部分诗歌深植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却并非简单的意象挪用。她擅长将古典意象“转译”为现代人的精神处境，在对李商隐、李清照



荣荣部分作品（蒋静 摄）

等古人的书写中，亦见其独特的当代视角。以《明月几时有》为例，标题取自苏轼名篇，内容却直指现代女性的命运，将古典的“闺怨”意象与“背阴处的飞蛾”“古镜”等略带诡异感的画面并置，营造出时空交叠的恍惚之境。这些古典符号，在现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焕发出新的诗意张力。她写《七夕》，却从反面切入：“被爱情迷醉的人多么危险/阻止她”——没有对牛郎织女爱情的颂扬，而是对“被爱情迷醉”的警惕与“阻止”。这种对古典节日的“祛魅”式书写，体现了她与传统的对话关系：她尊重传统，却不臣服于传统；她从古典中汲取意象，却赋予其当代表达的锋芒。

荣荣擅长在平凡叙述中突然“亮刃”。以《桃花劫》为例：“突然，有人问起我的桃花/一辆灰扑扑的车斜插过来/我急踩刹车。”艳丽的“桃花”与灰扑扑的“车”形成强烈反差，“斜插”与“踩刹车”则构成了镜头的骤然切换——浪漫的诗意与粗粝的现实迎面相撞，戏剧性由此而生。

更令人叹服的是她诗歌选取的角度。以《一个疯女人突然爱

上了一个死者》为例，一个疯女人，在送葬队伍前瞥见死者的遗像，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这是始料未及的/爱上一个死者是不是缘分？/昨天我撞上了他/出丧的队伍前 他的相片/在走 脸容多么亲切。”疯癫与佯狂，常是被压抑者最后的反抗姿态，然而这个女人的“疯”，恰恰是一种清醒。她的爱人如此高贵，如此孤独，她与他同气连枝，心有灵犀。真正的爱情，无关年龄悬殊，无关现实羁绊，甚至无关生死。这不是疯癫的呓语，而是对俗世爱情的一次彻底解构与超越。荣荣选择了一个最不可能滋生爱情的场所——送葬之路，来书写最纯粹的爱情。这种奇崛的角度，让平庸的现实的对比之下，愈发显得黯淡无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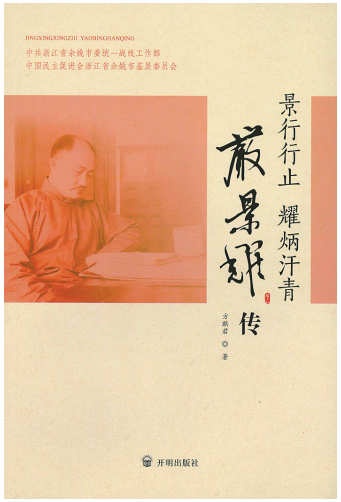
年少时读荣荣，总觉得她的诗不够唯美、抒情。如今回头再看，才明白那是她把惊涛按进了静水里。女性经验里的痛与暖、柔软与锋利，都被她压成一句句看似平常的话。诗歌的张力不在字面上，而在字缝里。人到中年，有了一定人生经历后，才真正读出她的诗歌的好：那种静水之下的深流。她的诗越写越往下沉，沉到生活最朴素的质地里去，再从那里面透出光来。

■ 阅读家 精神富有 阅读先行 ■

■ 宁波好书

从姚江岸到西柏坡

——写在《景行行止 耀炳汗青：严景耀传》出版之际



方麒君

2024年仲秋某日，我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居室平房前。在南方，暑气尚未消尽；在北方，已需长袖保暖了。一暖一冷间，我一时恍惚竟想不起缘何而来。时光仿佛被折叠，我下意识地在岁月的陡坡上攀援，伸手可触的是桂花，然后是梅花。哦，梅花香，这是抚触到严景耀44岁那年的光阴了。人们迎接春节，而大地迎接雨水、天空迎接惊雷……是的，那一年，非同凡响。在入住李家庄的前一夜，严先生在那儿，那平凡响。在入住李家庄的前一夜，严先生在那儿，那平凡响。在入住李家庄的前一夜，严先生在那儿，那平凡响。

如今走进这一所平房，我似乎听到余姚口音的不绝赞誉与无限感慨，闻到1949年春夜

梅花骤然怒放的清香。

2026年6月，《景行行止 耀炳汗青：严景耀传》一书由开明出版社出版。事起于2023年春天，我接到民进中央的严景耀生平研究课题后，着手从图书馆等处搜集各种史料。2024年春天，因参与策展严景耀雷洁琼历史资料陈列馆而有了各种实地走访。从姚江岸到西柏坡，严景耀走得磊落铿锵。他走了一遍，我抄近路也走了一遍。并由此将课题研究扩展为撰写一部传记。

传主严景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犯罪学拓荒者与奠基人，生于1905年，浙江余姚人，成长于上海，求学于燕京。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在苏联工作约一年，于1935年回到燕京大学执教，与同在燕京大学执教的雷洁琼相遇、相识、相知、相恋，很快就经受“一二·九”运动洗礼……《景行行止 耀炳汗青：严景耀传》书写了严景耀70余年的人生历程，结合家世、行迹、交游、学术、事功等，整体反映了传主生于乱世、寒门逆袭、追求真理、心怀天下、为人正直、虚怀若谷的生命状态、价值追求、卓越贡献和不俗风骨。

纸上的严先生，通过书斋案头工作可感知。地上的严先生，需要实地行走去“遇见”。

在去李家庄前两个月，我先去的是北京燕园。夏天的风吹着，感觉不到一丝燥热。严先生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的重要时光，都在燕园度过。在燕园，他遇到恩师们引他研究犯罪学，遇到志士们领他抗击来犯敌寇，遇到一生知己携手风雨数十年，遇到召唤前往西柏坡……四年大学两年硕士，美国读博后返校任教一年，抗战胜利后返校任教五年，自安徽特批调到北京大学（使用燕京大学校址）任教直至离世的四年，燕园如此反复穿插、占据他的人生，可谓他“立德、立功、立言”的一个独特场域。

因着吴建平先生的牵线，我联系上北京大学档案馆，沿着无名湖畔行走，博雅塔倒映在湖面。在北大档案馆，我见到了严先生的学籍卡、成绩单、书信、便笺，泛黄的纸页上是一行中英文的俊逸字迹。我不禁怀想，那纸页是严先生触碰过的，那字是严先生亲手写上的，此刻我的目光逡巡，岂不是与严先生有了穿越百年的“对话”？

从北大档案馆出来，我穿过草木石林，阳光斑驳，曲径通幽，我走向严先生的住处。这个家，曾经谈笑有鸿儒。1949年春天，根据部署，从李家庄回到北平迎接解放的知名人士，有几位曾随严先生歇在他们家。在这里，他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我端详着门牌号“62”，久久不能挪开目光。

而去燕园之前，我还去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旧址。自1936年起，严先生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七年，参加上海爱国出版与社团组织复社，在讲习所讲课，营救被捕的进步青年及地下党员……

监狱内外，他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我是在2024年端午节前去的提篮桥监狱旧址，如今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看到空旷处有一棵枇杷树，果实累累，满树金黄。

读传记校样时，我感慨良久，写了一首《致景耀先生》。并将其推荐给了本书责任编辑、开明出版社副总编辑柴小星，她同意将诗印在书籍封底：

突然与您相遇，古希腊的乡/推算您在我的此刻，正是去了西柏坡/正是三登北平城楼的高光年月/我欣喜，从您的眸眸读取双甲子的烟云：/当浙东运河的浆橹欸乃王朝的残影/您从四书五经的庭院出走，在上海街头/闷峭响的肩胛为什么没有面包——/仁者不觉其仁，诚如眼睛看不见眼睛/当拯救变成自觉，伏案若匍匐/行走亦铁镣沉重。于是，您的脚印深深/无论布拉格、芝加哥或莫斯科/无论1935年的燕园、1946年的江南，或余姚。/突然与您相遇，您终究缓缓转身离去/影影绰绰，我招手向您喊一声：“先生！”/猛抬头，望见星斗或是一道门……/当您挺起腰而卸下所有，世间无罪。

在北京霄云里的一个展览馆内，陈列着一只严景耀先生用过的行李箱，上面贴满了各国文字的行李标签。我在心里说，严先生走在前面，这只皮箱，我们帮他拎一拎。

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共享，一部传记的意义在于传承。在正道上行，我看见前面远远引路的那位擎火者。



《跟着文物穿行蜀道》

作者 文博时空

出版 五洲传播出版社

日期 2026年5月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千多年前，李白的一声长叹，为蜀道烙下了险峻奇绝的文化印记。从此，蜀道在人们的想象中，就是一条由绝壁、栈道与愁云惨雾构成的艰险之路。“文博时空”所著的《跟着文物穿行蜀道》，却让我们穿越诗人的浪漫与悲情，从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中，窥见这条千年古道更为真实、雄奇且充满人间烟火的一面。

作者采用“透物见人见史”的叙事策略，没有沉溺于对蜀道艰险的文学性描绘，而



《小镇青年》

作者 曾高飞

出版 作家出版社

日期 2026年4月

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小镇青年》是作家曾高飞的最新作品。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的湘南小镇为背景，讲述了一群乡村青年高考落榜、进城务工、回乡创业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在不同人生关口上的挣扎与坚守。

从小说所描绘的情感与现实的撕扯关系，可见作者对生命价值的洞察：许深深背负情

债与家庭悲剧考入大学，张美生为爱让出高考机会，最后扎根乡土创业，男女主人公生活波折的戏剧化模式加重了故事的矛盾冲突。也正因如此，作者才能层层深入刻画青年一代在成长中逐步树立起来的积极向上心态。

作者将故事开始的时间节点设置在高考前后，叙事紧凑，张弛有度。再以巧妙的构思，展开故事情节，让主人公在理想、现实的反拉扯中完善自我。小说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张美生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肖斌家境优渥仍拼搏向上，他们给当代青年提供了成功的参照。

《小镇青年》是曾高飞对自己青春年华的回馈，是对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深情回望。在《小镇青年》自序中，他写道：“我的心和根被遗忘在了那个被现代文明冲洗得面目全非的乡下——那个已经没有土砖瓦房和炊烟的村庄。”好在，这份失落没有让他陷于怀旧之念，反而激发了创作欲望。

这部扎根泥土的作品，恰似一束穿越三十年的微光，照亮在社会里跋涉的平凡灵魂，并以此来激励有志青年：城市固然美好，乡村亦能创造辉煌，只要保持奋斗之心，人生同样可以成功。

（推荐书友：陈裕）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

作者 刘宗迪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日期 2024年2月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的作者刘宗迪，以多重视角聚焦七夕节这一传统中国节日，并告诉我们：在漫长的七夕文化中，闪耀着中国人的浪漫优雅和开放包容。

哀怨动人的牛郎织女故事，实则是远古先人观象授时、男耕女织的传统，乞巧、观星等节

是将来自38家博物馆的150件文物作为历史的坐标与叙事的锚点。

从兵戈战鼓到日用器物，从异域奇珍到传世画作，这些文物不再是博物馆展柜中孤立的审美对象，而是被重新纳入蜀道的历史脉络中，成为讲述故事的亲历者。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诉说的是秦并巴蜀的金戈铁马；一件唐代的“飞仙阁”摩崖造像，映射的是丝路商旅的精神寄托；一幅宋代的《栈道图》，则凝固了古人征服天险的工程智慧。通过这种“以物证史”的方式，蜀道从抽象的文学意象还原为具体可感的历史遗迹。

在结构上，该书巧妙地构建了“路”与“人”的双重叙事维度。一方面，作者沿着古道、褒斜道、金牛道等古道脉络，清晰地梳理了蜀道作为交通工程的前世今生，揭示了其作为“帝国高速路”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又跳出地理的局限，将目光聚焦更具体的现实侧面：秦岭的自然风貌、工程背后的科学理性、蜀道旅人的日常生活。

全书温情地复原了千百年前行旅者在蜀道上的“衣、食、住、行”。这是一部视角独特、制作精良的文化读本。跟着文物穿行蜀道，我们走过的，不是一片片荒凉、死寂的古遗址，而是一条至今仍在中华民族血脉中强劲搏动的文化遗产之路。

（推荐书友：赵昱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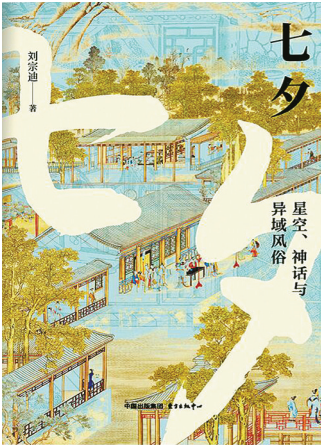
张美生为爱让出高考机会，最后扎根乡土创业，男女主人公生活波折的戏剧化模式加重了故事的矛盾冲突。也正因如此，作者才能层层深入刻画青年一代在成长中逐步树立起来的积极向上心态。

作者将故事开始的时间节点设置在高考前后，叙事紧凑，张弛有度。再以巧妙的构思，展开故事情节，让主人公在理想、现实的反拉扯中完善自我。小说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张美生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肖斌家境优渥仍拼搏向上，他们给当代青年提供了成功的参照。

《小镇青年》是曾高飞对自己青春年华的回馈，是对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深情回望。在《小镇青年》自序中，他写道：“我的心和根被遗忘在了那个被现代文明冲洗得面目全非的乡下——那个已经没有土砖瓦房和炊烟的村庄。”好在，这份失落没有让他陷于怀旧之念，反而激发了创作欲望。

这部扎根泥土的作品，恰似一束穿越三十年的微光，照亮在社会里跋涉的平凡灵魂，并以此来激励有志青年：城市固然美好，乡村亦能创造辉煌，只要保持奋斗之心，人生同样可以成功。

（推荐书友：陈裕）



俗无不与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洞悉与顺应息息相关。刘宗迪从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节的起源谈起，介绍七夕的确立与历代七夕的主要节俗，对宋代七夕风俗及其异域风情和异域渊源进行了探究，关注到东南沿海的拜织女星风俗，钩沉出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透过民俗学的考察，了解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

七夕乞巧节和牛郎织女故事，之所以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源于观象授时这个共同的源头，是由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农桑传统和天文知识所生发出来的两朵并蒂之花。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当属东汉学者崔寔所撰的《四民月令》，其“七月”条中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务。“按照习俗，初七这天，还要曝晒书卷及衣裳。”事实上，晒书、曝衣，在后世一直是七夕节风俗中的重要一环。

宋代，七夕节出现诸多新生物物，最为当时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泥孩儿摩睺罗。作者对摩睺罗的身世展开追寻，揭开了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康国等粟特国家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在游走中国经商的同时，将相关文化和风俗传入中国。

（推荐书友：甘武进）